

用童眸观历史 以故事传精神

——山西近年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追求与实践

邢 龙

双塔

山西，作为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敌后根据地的发源地、全民抗战的典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不仅是历史的丰碑，更是新时代的精神火炬。近年来，山西在儿童文学领域推出了一批精品之作，如葛水平的《黄铜小号》、张卫平的《红星树下》、蒋殊的《红星杨》、《少年之约：跨越时空的红色承诺》、郭万新的《将军台》、《双春年》，以及希望杯“原创儿童文学”获奖作品、金凤的《晋阳星火》等，以文学的形式为青少年讲述山西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实现价值观教育审美转化

儿童文学作为面向青少年的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以其特有的儿童视角、情感温度与生活气息，让历史记忆变得更加鲜活可触。

相较于其他文艺作品，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将宏大历史作为叙事背景，更加注重个体生命经验，通过儿童视角再现了抗战时期山西军民的生活图景。《将军台》以“百团大战”为背景，记述了雁门关外乡村儿童二梆柳勇敢地投身抗战、帮助共产党游击队杀敌抗日的成长经历；《黄铜小号》书写的黄崖洞保卫战中小英雄崔振芳使用过的黄铜小号；《红星树下》初稿名为《朱德儿童团》，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长治市武乡县王家峪村的“朱德儿童团”；《红星杨》将八路军的红色历史与太行山的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儿童视角展现战争年代的民族精神，传递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意志和对和平的渴望；《双春年》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关系真实刻画，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本身，更保存了乡村的生活细节与文化记忆。

历史不仅是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更是无数普通人、甚至是孩童的生命历程。这些作品所传递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并非以说教方式呈现，而是通过故事的自然展开、人物

的命运选择悄然传递，实现了价值观教育的审美转化。

形成独特地域美学风格

虽然每位作者各有其风格，但总体而言，这些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深深植根于山西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土壤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美学风格。

面对山西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几位本土作者均作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工作。精读文本，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承袭自“山西药蛋派”的特点，如语言质朴通俗，民俗特色强，注重真实性、故事性也是其较为突出的特点。由于儿童视角带来的清新、童真贯穿于文本，让山西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在“革命现实主义”之上增加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葛水平的《黄铜小号》是典型的代表。作品的语言整体上质朴通俗、简洁明快、贴近生活，多用日常口语和民间俗语，使故事更具亲和力和真实感。书中融入大量太行山地区的民俗文化、方言和生活细节，如各种民歌、童谣及“捉月华”“打月饼”等传统习俗，以及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增强了故事的文化底蕴。书中多次出现“月华”等象征意象，既营造出诗意氛围，又隐喻主人公的纯洁心灵和对和平的向往。

《将军台》《双春年》细致描摹雁北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农耕生活。以《将军台》为例，书中大量使用山西雁北地区的方言词汇和口语表达，如“二梆梆”“打半”“走高脚”“洋烟蛋”“潘圪蛋”等，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和乡土气息。文中还穿插童谣、民谚，如《答帚谣》，如“小满前后，点瓜种豆”“立冬不吃饺，冻死一旮旯”，既推动情节，也烘托民俗氛围，展现独特的山西文化特色。

《红星杨》《红星树下》中都提到那棵树枝断面呈现五角星形状的杨树，这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奇观，更是山西抗战文学的地域象征。作者通过这一意象，将山西的地域特征与

红色文化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审美对象。

追求多元创新文学表达

纵观山西今年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可以看到，艺术多样性、创新性已成为创作者的自觉追求。葛水平、张卫平、郭万新、蒋殊、金凤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山西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也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他们的作品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创造性转化，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对儿童心理的真实把握，构建了一种兼具历史厚度、地域特色与艺术魅力的叙事传统。

《红星树下》将严肃历史题材与儿童喜爱的悬疑叙事相结合，并且融入魔术、说书等民间艺术，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底蕴，也增强了叙事的趣味性和地域特色。同时，作者在反派角色的复杂性以及儿童角色的真实性上下功夫，尝试在可读性与教育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

蒋殊的《少年之约：跨越时空的红色承诺》，是一部文学与科技碰撞融合的作品，通过“文字+插画+音视频+AI数字人互动”的多元化形式，用15个80年前的少年故事，构建当代少年与烽火少年隔空对话的场景。

当然，将视野拓宽到整个中国儿童文学领域，乃至整个抗战文艺领域，当前的作品仍表现出一些不足之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让抗战历史在儿童文学中获得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地域特色成为提升作品艺术品质的资源而非限制？山西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但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待探索。未来的山西抗战儿童文学创作，或许可以在叙事视角、时空结构、象征体系等方面进行更加多样化的尝试，使这一题材焕发新的艺术活力。

张
贵
桃

《西游记》中数字的奥义

数字是人的一生最初接触的知识，一个小孩牙牙学语，大人就开始教他从一数到十了。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每一部作品中自然会有数字出现，然而在文学作品中，数字留下重大意义与影响的，莫过于《西游记》了。

“八百里”是个虚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容山水之广。此说源于《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二是代指健壮跑得快的牛。此说源于《世说新语·汰侈》：“王恺有牛，名八百里驳，善于奔驰。”《西游记》沿用了“山水之广”这一含义，如：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荆棘岭、八百里七绝山、八百里狮驼岭等，并赋予这些山水新的含义：都是取经路上的必经之路，不仅又远又难走，而且都有很厉害的妖怪把守，成为取经路上躲不过的坎，共同形成八十一难一个完整的取经历程。

“八十一”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它是极阳之数九的九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臻于完备的状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评价《西游记》：“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八十一难在《西游记》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全书的情节就是围绕八十一难展开的。唐僧师徒四人面对八十一难，坚守信念，奋力前行，在攻坚克难中不断磨炼，不仅考验了智慧和勇气，也锻炼了意志和耐力。八十一难完成了，真经取到了，圆满了吗？没有。因为经卷浸在水内，晾晒时《佛本行经》被沾破几卷，所以至今不全，这正应了天地不全之奥秘也。取经是一个理想、一种追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理想和追求也永无止境。这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所在。

七十二般变化的“七十二”之数，源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七十二候。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源于中医经典《难经》：“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西游记》赋予这两个数字以新的含义。实际上七十二也是个虚数，意思是千变万化。金箍棒能缩至绣花针大小却重量不变，凸显孙悟空变化无常、心性无常。世界风云变幻，没有一秒是静止的，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面对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心想事成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具有幻想色彩的孙悟空形象，搭建了一座人类从现实社会通向幻想世界的桥梁。几百年前上天、入地、下海的非凡想象，如今正一步一步实现。因此孙悟空的形象，冲破了时空限制，超今越古，风靡全球。

“十万八千”，源于唐代高僧惠能《坛经》：“若论相里数，即有十万八千；若说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西游记》中“十万八千里”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菩提老祖教会孙悟空独门绝技筋斗云，速度极快，一个筋斗云就能飞十万八千里，说明孙悟空神通广大。二是长安到西天的路程正好是十万八千里。在佛教文化中，十万八千里与“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的教义相呼应，表示通过修行除去内心的恶念和邪念，如同走过十万八千里路程，象征取经之路遥远而不易。

如果说这几个数字的产生源溯广大群众并不十分熟悉，那么经过《西游记》这么一强化、延伸，就像给它们插上了翅膀，翱翔在群众文化生活的广阔天地里。特别是八十一难、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这三个词，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像闪耀在汉语词汇宝库里的璀璨明珠。

经典漫谈
(75)

从碎片叙事到完整诠释

——《志愿军：浴血和平》艺术特色之优缺点

何亦聪



《志愿军：浴血和平》(以下简称《浴血和平》)是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系列影片的终章。从剧情内容看，这部电影相比前一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增加了文戏的内容，一边是战争，一边是谈判，最终用血与火换来谈判桌上的妥协；从叙事风格看，则大体延续了前两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特点：采用多线索、全景式的战争史诗叙事，在再现历史的过程中注重对个体性格与命运的挖掘，整体上追求悲壮、崇高的美学风格。

战争史诗题材电影有其特定的拍摄难度，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商业风险与技术难度——拍摄成本高、服装特效要求高、战争场面不易还原等之外，更重要的是，导演与编剧该如何把握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宏观视角与个体生活，乃至历史感与故事性之间的平衡。一些网友批评《浴血和平》的故事结构过于碎片化，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某种程度上，碎片化是营造真实感的必要手段，如果导演执着于讲一个跌宕起伏的完整故事，那么，故事性本身反而会将真实感构成威胁——毕竟，历史不是故事，生活也不是。

《浴血和平》的重要艺术追求之一，就是通过对记忆碎片的整合，带给观众一种真实的历史质感。陈凯歌近年所拍摄的电影多用这种碎片整合的艺术手段，此前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都是如此，到《浴血和平》中，已在技术上表现得颇为娴熟。比如，影片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牺牲精神”的挖掘与表现，其中有各种不同的“牺牲”：前线冲锋倒在敌人火力网下的阵亡者，据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与敌同归于尽者，为完成定点

战斗任务而主动赴死者，后勤运输工作中的意外身亡者，为救护染疫士兵而付出生命的医护人员，带病坚持工作直至最后一刻的翻译工作者……当然，影片还重点表现了另一种牺牲：为了捍卫契约精神，坚持不在中立区开枪而主动选择牺牲者。这些不同的牺牲被以碎片的形式整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对“牺牲精神”的完整诠释。

从另一角度看，清晰的艺术追求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导演干预”的痕迹上，对于《浴血和平》这种类型的电影而言，干预痕迹应是越来越少。整体看来，《浴血和平》固然是一部堪称战争史诗的佳作，但其中的“设计感”有时不免过于明显，比如某些镜头、片段，可以清晰看出设计痕迹，人物的某些台词也无法生活化，带有生硬的戏剧腔。某种程度上，这种“设计感”会削弱观众的情感共鸣。

《浴血和平》的故事主线有两条：一条是外交、谈判，一条是军事、战争。两条线索具有逻辑上的高度同一性，形成一种双螺旋结构，彼此呼应，彼此佐证，并可以在节奏上张弛有度。陈凯歌的电影向来有对高于思想的“执念”，他不满足于仅仅再现历史或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从《黄土地》《荆轲刺秦王》《无极》到《道士下山》《妖猫传》和《你在一起》都是如此，《浴血和平》当然也不例外。这部电影的思想核心是对“和平”的思考，无论是“浴血和平”这四个字，还是电影中李晓与林月明围绕和平展开的反复辩难，又或者是停战时刻到来前双方士兵的倒计时与欢呼，都处处体现出思考的痕迹，其意旨非常清晰：和平是谈出来的，也是打出来的，更是无数先烈倾洒鲜血、牺牲生命换来的。

散文“鉴抄”不能断章取义

卓一苇

当下，“鉴抄”已由小说领域波及散文领域。一些博主、写作者摘取某作品其中一段或几段，截图作对比，引发围观和讨论。网友急切地从中寻找疑似句和重复点，然后兴冲冲地宣告抄袭无疑。但我认为借用他人文本，应该分情况而言。

先说这种观念现行的实行方式。当我们与某博主建立信任关系后，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说的是事实，这其实是网络上的“熟人关系”所致。当他陈列出“事实”时，很多人往往都不会细看，轻易作出“文坛就是这样啊”的结论。这样，不少人的留言失去了理智，变成一种泄愤。没有了解清楚事情真相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这种“打倒一切”的劲头，是网络暴力，是最不该走向的方向。

然后我们谈谈散文“鉴抄”。散文和小说很不一样。两篇小说，即使作者都写苹果，立意、情节和技巧的不同，都会使文本发生变化。而且，小说本身的审美范式是多元的，可以俗一点或雅一点，作者想创新，那他完全可以避开

别人用过的词句。一句话，小说的广博决定了它的不可复制性。那么，拿一些“断章”来试析小说是否抄袭，可能真起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散文不一样，首先一点是散文有个很重要的传统——引用。这个传统，从古代散文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鼓励引用，认为“圣贤之言”含金量高；今人认同“述而不作”的观念，也愿意把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可替代的东西原样搬出，比如唐诗、宋词、先秦散文。引用的方式有几种，如明引、暗引、援用典故等，归根到底都不是原创。散文之外，运用文类更是大段引用、借用。引用的好处是，有助于增强说服力——古人如此说，大概错不了；营造美的意境——古人之遣词造句，无法替代；展现学识和修养——懂得多，但过分就成为掉书袋。然而，引用算不算抄袭？这恐怕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历史人物的生平、生卒年和史料中的故事肯定没

法改变。大致的故事经过，哪年去哪地见过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可能表达有出入，却大体相近或相同。这算抄袭吗？恐怕不能。再如，腊梅的植物学特征、唐代造纸业的情况，大部分人写出来都近似。又如阴晴圆缺、风霜雨雪、山水树木，古今感受也并无太大不同，把“月是故乡明”改写成“故乡的月好亮啊”也无可厚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AI生成内容疑似度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被检出100%AI生成内容占比率，说明什么？用查重系统“鉴抄”，在散文方面也是很不靠谱的。

当然，引用也讲究一个度，过度引用是缺乏原创力的表现。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逐字逐句地对照，如果完全一样，那是抄袭无疑。但如果只是部分相似，某些词语相同，或某些句子相似，那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一棒子抡下去，文坛的形象四分五裂，原创和非原创的作家全部挨打，对文学的良性发展有害而无益。

诗家、书家、画家、篆刻家……对他来说，应纪念《太原日报·双塔》创刊2000期“我与《双塔》”征文，他作了《《双塔》是这样诞生的》。

看到这两张报纸，我兴奋极了。好事的铺垫是9月26日我与赵望进先生在双塔公园偶遇，他跟我兴致勃勃谈起他当初策划“双塔”版诞生的过程。85岁的老人，谈起往事，好像是刚刚发生过的，那样清晰而细微。他说1979年国庆节前，中共太原市委决定，将《太原报》更名为《太原日报》，10月1日出刊第一期，他负责副刊版，为副刊开一栏目，取名为“双塔”，第一期的作者也由他来定。

这些作者几乎全是当时有名望的诗家、书家、画家、篆刻家……对他来说，应纪念《太原日报·双塔》创刊2000期“我与《双塔》”征文，他作了《《双塔》是这样诞生的》。

好事的铺垫是9月26日我与

赵望进先生在双塔公园偶遇，他跟我兴致勃勃谈起他当初策划“双塔”版诞生的过程。85岁的老人，谈起往事，好像是刚刚发生过的，那样清晰而细微。他说1979年国庆节前，中共太原市委决定，将《太原报》更名为《太原日报》，10月1日出刊第一期，他负责副刊版，为副刊开一栏目，取名为“双塔”，第一期的作者也由他来定。

这些作者几乎全是当时有名望的诗家、书家、画家、篆刻家……对他来说，应纪念《太原日报·双塔》创刊2000期“我与《双塔》”征文，他作了《《双塔》是这样诞生的》。

现在，两张报纸的报样，带着我穿越了，好珍贵呀！1979年的创刊号还是活字印刷，我有这样的工作经历，感怀颇多。1994年，报纸已经实现电脑排版，比起初创时期的“双塔”，深度、品位都高出了许多。

赵望进先生的文章回顾当年紧锣密鼓筹备“双塔”的过程，比如，为副刊取名，碰头会上，一下子列出好几个：“难老”“迎泽”“汾水”等，他提出了“双塔”，因为双塔高高耸立，是并州古城的象征，最后议定文艺副刊名为“双塔”。

我将第一张照片，即“双塔”创刊号报样一寸寸对照着赵望进先生的文章来读。头篇是作家马烽作的《祝贺与希望》，600多字，充满激情；左上为篆刻“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作者是徐文达，套红印在重要位置；左中是三首七律一首词，作者分别是刘秀峰、任善征、唐仁均和卫贤卿，主题都是为新中国成立30周年而作，这4位都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诗人；左下是国画《百花齐放》，由赵梅生、祝焘、王暗晓、王鸿滨、刘景秀、贾瑚、李夜冰、汪伊虹8人合作，此画体现了党的文艺方针；居中的书法“宣传党的政策，面向人民群众办好太原日报”和“双塔”二字均由著名书法家郑林题写。刚柔并济；刊头画是力群的木刻《双塔》，用刀见功夫；稍右是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自诗自书；右图是国画《十一晨曲》，一只长鸣的雄鸡站在有一束金菊的石头上，作者是赵延绪和朱焰，二人配合默契，构图搭配得当；右下是300多字的《致读者》，说明“双塔”的宗旨、内容和希望，这段文字，应该是赵望进先生所写了。

明白了，当年的“双塔”就是这样诞生的。久久地看着这张报样，心中念叨着这些作者的名字，他们可都是父亲的文朋诗友啊！

我自己是《太原日报》的老作者，多在“作品”版上发文，但我也因为与“双塔”的那份情愫，常常关注“双塔”版。很有幸，拙作《追怀吟叹古城新生——〈唐风集〉里的咏太原诗》分上、中、下三次刊登在“双塔”版；作家孙涛的文章《花蕾枝枝似去年——评刘小云散文》也发表在“双塔”版，我和“双塔”的缘分深着呢！

还是用父亲的诗《咏太原》中的尾联：“若非双塔东南峙，离客不知是并州”为此文作结。这句本是指物理上的太原双塔，原意是太原市变化巨大，离客只有看到双塔，才会知晓这里是由并州古城。而我用在此处，却又是一种意象了，暗指《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是立足太原本土，宣传本土文化的重要平台，关注和热爱“双塔”版，那种缘分是骨子里的。

借用赵望进先生的原标题，为我所用。